

計艷莉「軟硬兼施」做慈善

「作為一名政協委員，扶貧不僅僅要捐款，更要了解當地教育的現狀和需求。我所了解的情況是貧困山區與城市教育之間的差距非常大，縮小城鄉差距、改變貧困面貌，為貧困山區創造優良的讀書環境是斬斷窮根最有效的辦法。」甘肅省政協委員、香港青年議會副主席計艷莉說。多年來，她為甘肅地震救災和建設老人院、山區學校建設捐贈多筆善款。計艷莉日前在出席甘肅省「兩會」時告訴記者，今年她將繼續關注貧困地區教育，在捐資建校完善「硬件」的同時，更加注重貧困地區師生在知識增長、眼界開闊方面的「軟件」培訓，「軟硬兼施」開展教育慈善項目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肖剛、魏占興



計艷莉接受本報記者採訪。 記者 肖剛攝

去年，計艷莉通過本報在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捐建了一所學校，而該縣恰屬於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。「比較遺憾的是，因為父親患病處於術後康復期，母親的身體亦不是太好，公司的大小事務落到我一個人身上，一直沒能抽出時間到捐建的學校去看一看，了解老師、學生的需求，從而更好地幫助他們。」計艷莉說，「希望今年能抽出時間看望山區學童。」

「一家三委員」

計艷莉的父親計佑銘是前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志成國際集團董事長；母親魏鳳英則是貴州省政協常委、集團副董事長，無論在西南地區的貴州，還是遠在高原的青海，都有計佑銘和魏鳳英投身慈善的身影。

受父母影響，計艷莉甫一擔任甘肅省政協委員，即捐贈50萬元人民幣在甘肅興建了一座老人院。計艷莉表示，隨著老龄化社會的到來，甘肅不僅面臨老人的贍養問題，還有貧困問題，希望能通過實際行動帶動更多香港慈善團體關注甘肅，尤其是農村老人的贍養問題。

在2013年甘肅省岷縣漳縣6.6級地震中，計艷莉又代表「一家三委員」通過本報捐款30萬元，支援抗震救災。目前，計艷莉一家對甘肅的捐款已逾百萬元。「父親在沒生病前，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慈善事業。從小耳濡目染，我想把父親的慈善之路繼續下去。」計艷莉說。

建言物流業 促甘肅開放

此次參加兩會，計艷莉與其他港澳委員共同準備了一份促進甘肅物流業發展的提案。「因為公司業務多涉及歐、美、澳洲國家，所以考慮騰出一部分精力嘗試物流產業。」計艷莉說，「加之擔任政協委員後，了解到甘肅經濟發展落後，因此考慮通過物流帶動經濟發展。」

提案指出，2014年，甘肅省開通蘭州至迪拜、新加坡、第比利斯3條國際航班，2015年還將開通蘭州至俄羅斯、哈薩克斯坦等國的國際航班。隨着蘭州中川機場2號航站樓建成、蘭新高鐵開通運營、蘭州高鐵路正式啟用，蘭州無疑會成為西部物流的重要交通樞紐。

計艷莉表示，希望蘭州至香港的直航能快速開通，一旦開通，必然加強甘肅與珠三角地區交通物流網絡的連接，更利於甘肅承東啟西，借助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擴大開放。



甘肅省委常委、統戰部部長冉萬祥(右四)會見計艷莉(右二)等來自香港的甘肅省政協委員。 記者 肖剛攝



當地孩子在簡陋的教室裡讀書。 本報蘭州傳真

駱沙鳴：醫改永遠是進行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訊(記者 黃瑤瑛)針對近年來醫患糾紛頻發這一現狀，全國政協委員駱沙鳴和蔡國斌於去年全國「兩會」上提出的《關於加快醫療體制改革有效促進我國醫患關係和諧共贏》提案被評為全國政協重點提案，引起多方關注。

提案指，「以藥養醫」「過度醫療」是造成醫患矛盾加劇的重要因素之一，要有效化解醫患糾紛，加快醫療體制改革已刻不容緩。駱沙鳴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，看病難、看病貴是現今內地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，要解決看病難、看病貴難題，關鍵在醫改。

「醫改是個世界性難題，目前還沒有成功的模式，永遠是進行時。要針對不同國情、市情來處理醫改進程，協調各方面關係，不斷提升普惠性醫療的覆蓋面

和福利性標準。」駱沙鳴解釋說，因為歷史欠賬太多，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不足，像一些醫療人才的配置、醫療設備、基本醫療的保障體系還不能充分體現公平。此外公立醫院及專科醫院的醫療資源配置不盡合理，無法滿足多元的社會醫療需求。

廢除「以藥養醫」

駱沙鳴告訴記者，醫患血案雖然只是個案，但頻發說明30多年來中國醫改不完善，醫患矛盾在日益激化。

針對現今普遍存在的「以藥養醫」問題，駱沙鳴建議政府應保障公立醫療機構的運行經費，加大對醫療用房、設備、人才、技術、管理等能力建設要素的投入，由此解決病人看病貴、因病返貧的現

象，以避免醫患關係緊張。藥品零差價是一種改革嘗試，要建立合理藥物價格體系和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，改革不合理的藥品招標制度和醫保目錄形成制度。並加大政府對公立醫院公益性、公共性的體現，逐年提高投入機制。

駱沙鳴認為，政府給公立醫院的全額撥付太少，醫院日常的運營成本大都靠醫院自己解決，醫院要生存、要運轉，就要有創收，一部分錢就是依靠出廠藥物加價利潤獲得，這些成本必然轉嫁到病人身上。

他並表示，給藥品一個合理的利潤空間是被允許的，要遵循市場規律，這是國際慣例。但應杜絕藥價虛高，可以把合理利潤用在藥物損耗、贊助一些學術活動或者是健康教育方面，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。



駱沙鳴在義診。 本報福州傳真



駱沙鳴深入基層調研。 本報福州傳真

避免「過度醫療」 倡建醫患調解機制

在駱沙鳴看來，「過度醫療」也是醫患矛盾難以協調的一部分，但當前醫患關係緊張，又缺乏一套比較合理的調解機制來解決，醫生為免責就可能給病人進行各種檢查，無形中增加費用。若是慢性病、疑難病、惡性病，將更陷入惡性循環，醫患矛盾更加不可調解。

因此，醫患之間的溝通就更為重要，駱沙鳴指出，現在醫學模式是生物心理社會的醫學模式，對患者進行健康教育、包括住院術前的談話溝通都是必要的，以免患者心理扭曲，出現一些過激行為，造成矛盾糾紛加劇。他認為，應將醫療保障重點放在預防和康復上，不要

把有限的醫療資源耗費在檢查與治療上。實行精細化管理、多元化服務。中醫強調的是治「未」病，就是預防、防範還沒有發生的病或者小病，早發現、早治療，醫療費用會少；一旦發展為重症，社會、家庭和個人的治療成本大，病人和家屬也不滿意，這也是造成很多過激行為的根源。

引入「第三方」機制

「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出現問題，直接找醫院、找醫生其實是不合理的。」醫生出身的駱沙鳴無奈地說，這對

醫生的工作造成困擾，亦是對人身安全的威脅。

駱沙鳴建議，加強制度設計，分階段、分步驟將醫療責任保險強制推開，通過保險體制來化解矛盾，一旦有糾紛，通過第三方機構來鑒定，糾紛的醫患之間少見面，只要各方機制健全，理賠的難度降低，讓受害者、患者都得到應得賠付，各方利益均有保障。

駱沙鳴說，也可讓一些社會資金、慈善機構介入，建立多層級的救助保障機制，對大病費用進行統籌，對一些特殊病種、罕見病種等提供救助，給患者及其家屬更多安全感，也能緩解醫患矛盾。

人民政協的「前世今生」

從工農共和國到人民共和國

宿正伯



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。資料圖片

袁文才、王佐之被錯殺，原因錯綜複雜。由來已久、結怨甚深的土客籍矛盾，袁、王二人的心高氣傲、桀驁不馴，彭清泉、彭德懷等人的偏聽偏信、疏忽大意，都是重要因素，但歸根結底，還是因為當時中共中央對非農階級的認識甚是偏激。

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「六大」，通過了《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》，提出：「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，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，並嚴厲的鎮壓他們，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。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，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。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滅。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，是危險異常的。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，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，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，決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。」這便為排擠、殺害袁文才、王佐提供了政策依據。

毛澤東在井岡山傳達六大精神時，刻意迴避了袁文才、王佐。其後，又與朱德、陳毅等領導人達成共識，認為袁文才、王佐作為綠林好漢，不能與土匪相提並論，並採取恰當措施保護了袁、王二人，但在毛澤東離開井岡山的時間裡，發生了激烈的爭鬥，最終導致袁、王二人遇害。無獨有偶。與鄧小平、張雲逸、韋拔群等一起領導百色



李明瑞(1896-1931)，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7、第8兩軍總指揮，1931年5月任紅軍第7軍軍長，同年10月在「肅反」擴大化中被誣陷殺害，1945年獲平反昭雪。 資料圖片

起義的著名將領李明瑞，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井岡山反圍剿鬥爭中，發揮了重要作用，立下了不朽功勳，但也因曾是國民黨將領而在1934年「肅反」運動中被錯殺。持續四年之久的「肅反」運動，正是中共早期左傾「關門主義」佔據主導地位的結果，其發動並非毫無緣由，但卻在某些地區和軍隊嚴重擴大化，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曾在回憶中悲痛地說：「將近三個月的『肅反』，肅掉了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，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、殺害。」1934年7月，意識到重大失誤的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「肅反」的指示，運動方告結束。

遺憾與瑕疪，何處不在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光彩不因此而稍減。誕生於1931年的蘇維埃政權，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的第一個輝煌。1935年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，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，瑞金自此成為歷史記憶中的革命聖地。

1935年12月，已經到達延安的中共中央，面對全民抗戰的新形勢，決定把「蘇維埃工農共和國」改為「蘇維埃人民共和國」。一詞之差，意味著政權不再僅僅歸屬於農工，而應歸屬於一切抗日的階級、階層和黨派。這一改變，不僅僅是應對抗日形勢的權宜之舉，本質上是對新民主主義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政權實踐認識的真正深化。在中共民主政治建設中享譽中外的「三三制」政權，隨之登上歷史舞臺。

連載 20